

# “宫廷爱情”与欧洲中世纪研究的现代性

李耀宗

**内容提要** 自 19 世纪以来,“宫廷爱情”已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回顾和分析中世纪学者加斯通·帕里斯的原始论文,指出“宫廷爱情”的观念是现代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的产物,而非中世纪唯一或典型的爱情观,更非“一种全面的文化现象”。自文艺复兴以来,学者们或把中世纪当作与现代截然不同的“另类”,或认为它与现代相连通,故中世纪研究本身就具有一种现代性。“宫廷爱情”为中世纪研究者提供了建构和解构各种思想体系的话语素材,也充分表现了它的现代性。

**关键词** 宫廷爱情 加斯通·帕里斯 欧洲中世纪研究 现代性

1881 年 2 月,法兰西学院的首任古法语与文学讲座教授保兰·帕里斯(Paulin Paris)逝世。<sup>①</sup>他已于 1872 年退休,由儿子加斯通继任讲座。加斯通·帕里斯早年曾被父亲送到德国波恩大学去跟弗里德里希·迪艾斯(Friederich Diez)学习罗曼斯语文学(Romanische Philologie)<sup>②</sup>,回国后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他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他父亲,成为 19 世纪后半期古法语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而影响最深远的却是他发明的一个术语,即“宫廷爱情”(amour courtois),该术语首次出现于 1881 年 10 月。

关于所谓宫廷爱情的起源这段历史公案,学者争议了一个世纪都没有定论。可是,“宫廷爱情”一词的起源却是可考的,就是加斯通·帕里斯于 1881 年和 1883

<sup>①</sup> See David F. Hult, “Gaston Paris and the Invention of Courtly Love”, in R. Howard Bloch and Stephen G. Nichols, eds., *Medievalism and the Modernist Temp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6, p. 202.

<sup>②</sup> See Hans Ulrich Gumbrecht, “‘Une Souffle d’Allemagne ayant passé’: Friedrich Diez, Gaston Paris, and the Genesis of National Philologies”, in *Romance Philology*, 40 (1986), p. 23.

年发表在《罗曼尼亚》学刊上讨论圆桌骑士罗曼斯的两篇文章里。<sup>①</sup>这个术语出自大师之手，很快就被学者广泛采用，它的内容也逐渐包罗万象，俨然成为中世纪爱情的典型，可以用来解读一切中世纪文学作品里的爱情主题。到了20世纪下叶，在一本综论宫廷爱情的专著里，罗杰·鲍厄斯称它为“一种全面的文化现象：一股文学潮流，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伦理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里游戏元素的表现”<sup>②</sup>。虽然60年代出现过对它质疑的呼声，部分英美中世纪学者也开始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宫廷爱情”一词仍然经常出现于学术著作（甚至大众媒体）中，仍然是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里引人注目的题目。正因为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含义混淆不清，用它来解读文学作品弊多于利，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宫廷爱情”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有这么强韧的生命力？

“宫廷爱情”这个词在中世纪文学里极其罕见，它的定义完全是现代学者的发明。他们关怀的问题、论证的依据与方法、表达的方式和意识形态，都表现出中世纪文学研究的现代性。本文将分三节论证这个命题：首先检验加斯通·帕里斯奠基性的论文，了解他所发明的“宫廷爱情”是什么，再说明中世纪（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然后考察现代学者关于“宫廷爱情”的论述所表现的现代性。

## 一、加斯通·帕里斯的“宫廷爱情”

加斯通·帕里斯在1881年的论文里已经为“宫廷爱情”埋下伏笔，指出朗斯洛（Lancelot）与圭尼维尔（Guenièvre）的爱情是一种新的观念，在早期凯尔特是不存在的，它是后来法国人的新发明。在1881年《罗曼尼亚》第10期的第478页，他首次把它命名为“宫廷爱情”，还特地将“宫廷”一词印成斜体以标新立异，因为在他以前，并没有人这样称呼这种爱情，19世纪作家、学者只用“骑士的”（chevaleresque）或“风雅的”（galanterie）来形容中世纪抒情诗和罗曼斯里的爱情。他1883年论文专门研究克雷蒂安的《囚车骑士》（*Le chevalier de la charrette*），主要是反驳他父亲和其他学者关于作品年代的论证，在最后一节才用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宫廷爱情”的定义和来源。在1883年《罗曼尼

<sup>①</sup> See Gaston Paris, “études sur les romans de la table ronde”, in *Romania*, 10 (1881), pp. 465–496; “études sur les romans de la table ronde: Lancelot du Lac,” in *Romania*, 12 (1883), pp. 459–534.

<sup>②</sup> Roger Boase,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Courtly Love: A Critical Study of European Scholarship*,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77, pp. 129–130.

亚》第12期的第519页，也用斜体字强调“宫廷”一词。

他根据克雷蒂安《囚车骑士》里朗思洛与圭尼维尔的爱情给“宫廷爱情”下了定义，列出了其四大特征：1) 不合法的、婚外的；2) 情妇高不可攀、冷若冰霜、变幻多端，情人地位卑下，如果触犯爱情的法规，就会失去爱情；3) 情人得以英勇表现和高尚品格去赢取佳人芳心；4) 爱情是一套艺术、学问和规矩，必须努力学习、严格遵守才有资格做情人。他强调这种有法国人特色的爱情和凯尔特的“骑士爱情”大不相同，特里斯丹和绮瑟的爱情只能算是狂野的激情，虽然天真烂漫，却粗糙不堪。而南方奥西坦（Occitan）诗歌的爱情虽然典雅精妙，却是“头脑的爱情”，不是“心坎的爱情”。加斯通·帕里斯认为发明“宫廷爱情”的法国人就是克雷蒂安，后者首次成功地把凯尔特的“骑士爱情”和法国的宫廷文化、南方和北方的爱情观结合起来。

为了把“宫廷爱情”更具体地落实在法国，加斯通·帕里斯又根据安德莱阿斯·卡培兰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拉丁文的《论爱情》（*De amore*, 1180-1200）对香槟朝廷里的贵妇们评议爱情的描写，推论出这种新的爱情风气是由阿基坦的埃莲诺尔（Eleanor of Aquitaine）从英国、经过她的女儿玛丽（Marie）带到法国，后者委托克雷蒂安创作出《囚车骑士》。加斯通·帕里斯花了相当篇幅讨论安德莱阿斯的《论爱情》，把香槟朝廷描写成一个宫廷文化的中心，《论爱情》里的爱情评议和爱情法规就成为他界定“爱情是一套艺术、学问和规矩”的理论依据。不过，为了命题成立，他只讨论《论爱情》的前两卷，只字不提推翻前两卷论述的第三卷。而他把那篇纯属虚构的游戏文章当作历史事实对后世学者影响极大，从此以后，《论爱情》成为研究“宫廷爱情”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依据，也是一部最有争议性的中世纪著作。<sup>①</sup>

最近中世纪学者也认识到“宫廷爱情”之发明的现代性。戴维·赫尔特指出，加斯通·帕里斯从父亲去世那年开始全盘推翻他的学术成果，“宫廷爱情是一种艺术、科学和规矩”，不是单纯的感情和欲望这个特色，是他以科学实证的“批评”取代他父辈们靠直觉、凭经验、无规章的“欣赏”的主要实例。<sup>②</sup>而R. 霍华德·布洛克则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档案里翻阅加斯通·帕里斯当年的书信，找到“情人遥不可及”那个特色的原版。原来加斯通·帕里斯喜欢他1871年新

① See Betsy Bowden, "The Art of Courtly Copulation", in *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9 (1979), p. 67; "His treatise on 'courtly love' seems too serious to be funny, too funny to be moral, and at the end too moral to be serious."

② See Hult, "Gaston Paris and the Invention of Courtly Love", p. 211.

寡的姐姐,“宫廷爱情”含有他因父亲之死而释放出的“姐弟(或兄妹)乱伦禁忌的下意识表述”<sup>①</sup>。更为重要的是,加斯通·帕里的定义提示了“宫廷爱情”的体系性,使后世学者热衷于建构体系,譬如1896年在美国就出版了一本叫《宫廷爱情体系》的专著。<sup>②</sup>作者以种族区分法国与凯尔特、北方与南方的爱情,带有强烈的19世纪民族主义色彩,也具有现代性。

## 二、中世纪文学研究的现代性

在一篇讨论现代性的论文里,史提芬·尼古拉斯谈到19世纪(包括加斯通·帕里斯)的中世纪研究时说:“现代主义是中世纪研究的秘密议程(hidden agenda)。”现代到底是什么?他引用尧斯的研究指出,晚期拉丁文(5世纪)“modernus”一词来自modo,意指“现在”,以与antiqui(过去)相区别。<sup>③</sup>米歇尔·德·塞尔托也说:“现代西方历史实质上开始于现在与过去的区分。”<sup>④</sup>这种区分后来逐渐发展成新旧与古今文化孰优之争。现代是一种与过去自觉的差异,一种文化认同与歧异意识。它的特色就是不断地检验、修正和推翻既有的知识,不断寻求新的知识。

这种现代与进步的认识,在12世纪就出现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的《辩学篇》(Metalogicon)里。他说沙特尔的贝尔纳(Bernard of Chartres)做过一个比喻,现代人像是骑在古代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现代人个子虽小,却看得比古人更远。克雷蒂安在《克里杰》(Cligès)里引用“帝国与学识的转移”(translatio imperii et studii)的说法,强调知识与权力、诗歌与帝国已经从希腊、罗马转移到法兰西,也表现出现代感和进步意识。<sup>⑤</sup>

在西方历史里,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和不断求新的进步意识形态,开始于文艺复兴。从此,中世纪与现代成为一对难兄难弟或双胞胎。布莱恩·斯托克对它

---

① R. Howard Bloch, “‘Mieux vaut jamais que tard’: Romance, Philology, and Old French Letters”, in *Representations*, 36 (1991), p. 77.

② See Lewis Freeman Mott, *The System of Courtly Love: Studi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Vita Nuova of Dante*, Boston [u. a.]: The Athenaeum Press, 1896.

③ See Stephen G. Nichols, “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edieval Studies”, in Bloch and Nichols, *Medievalism and the Modernist Temper*, p. 26.

④ Michel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 Tom Conle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p. 2.

⑤ See Lee Patterson, *Negotiating the Past: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Medieval Literature*,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184–185.

们的关系作了很简洁的说明：“文艺复兴发明中世纪来界定自己，启蒙时期保持它来夸奖自己，浪漫时期恢复它以便脱离自己……‘中世纪’成为现代世界最流行的文化神话之一。”<sup>①</sup>也就是说，中世纪成为现代界定自我的“他者”（other）或“另类”（alterity），把过去称为中世纪的一千年当作一块空白的屏幕，任由后人把自己的厌恶、恐惧、欲望和幻想投注到里头或投射在上面。因此，这些对中世纪的论述都不免带点现代人的观点，也就是现代性。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排斥腐旧的中世纪，以承续希腊、罗马文化为己任。当然，中世纪文化并没有一下子就消失了，仍然继续存留了好几个世纪，尤其是它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也只局限于意大利的几个城市，它的重要性也是现代学者的发明。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摒弃基督教，和中世纪文化仍有水乳交融的关系。而西方人从17世纪开始对中世纪文化认真研究，也与基督教会抢救自己的历史传统有关，从那时起，基督教一直是中世纪研究的主要题目和认同对象。如波朗德派（the Bollandists）对基督教圣徒传记的收集与整理，莫尔派（the Maurists）本笃会修士收集的宗教与历史材料（如十字军出征史）和19世纪雅克-保罗·米涅（Jacques-Paul Migne）收集出版几百巨册的希腊和拉丁教父文集，都成为现代中世纪研究的基本材料。而大多数西方学者有意无意中一直以基督教观点去研究中世纪，与中世纪作不同程度的认同。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前者（也就是中世纪）固定不变，后者则不断改变更新。工业革命与商业竞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又助长了浪漫主义对中世纪的幻想和怀念（如制度与精神的复古、回到等级分明的和谐社会、贵族与王权和天主教的神权体制复辟）。而现代的中世纪研究要到19世纪才成为专门学科，以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客观地研究中世纪，并且反制启蒙时期对传统与中世纪的看法，论证中世纪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强调它的现代性。<sup>②</sup>

中世纪研究学术化和专业化与现代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出现有关，罗曼斯语文学的创立，就是当时的民族国家主义兴起的产物。据李·帕特森的看法，19世纪中世纪研究建立的两个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思想史论（Geistesgeschichte）。前者客观研究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和建构思想体系，后者论证一切文化产品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本质或精神的表现，就是时代背景和语境决定文本的意

① See Brian Stock, *Listening for the Text: On the Uses of the Pa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0, p. 69.

② See Stock, *Listening for the Text*, pp. 159 - 160.

义。<sup>①</sup> 在民族国家主义的背景下，中世纪就成为民族文化的精神来源。采集、整理、编订、出版中世纪文本，文字训诂、源流与影响的考证都成为学者的主要任务，文本的艺术性却无人过问。

为了肯定中世纪是现代文明的起源，学者们开始建构各种中世纪的体系，把现代的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形成等都和这些体系连接起来。这样强调中世纪的现代性的研究方向，到了 20 世纪，更表现于各种“大叙述”，如“12 世纪的文艺复兴”、“发现个人”、“浪漫爱情的发明”等。这种对中世纪文化认同与排斥的辩证逻辑在尧斯的理论达到统一。他一方面强调中世纪文学的“另类性”能带给现代读者独特的美感和世界模型，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从“另类性”找到中世纪文学的现代性。<sup>②</sup> 同时，保罗·尊托认为中世纪里有“他者”，也有现代，一种既熟悉又陌生、既遥远又接近的过去。因此，一定要通过博学审问才能发现“他者”和它带来有历史痕迹的乐趣。<sup>③</sup>

可是，19 世纪的历史主义模式在 20 世纪受到根本的挑战，早期有新批评派，主张文本才是研究的唯一对象，排除了一切文本以外的因素，弥补了过去语文学忽视美感意义的缺陷。新批评同时也重新引起研究中世纪的修辞学的兴趣，对中世纪的诗学取得进一步的理解。可是，这种只注重文本现代意义的研究也受到虔信基督教传统的学者的反弹，出现了以小罗伯逊（D. W. Robertson, Jr.）为代表的释经派（Exegetics）。后者相信中世纪的作者和读者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写和读的作品里不会有现代读者理解的意义，只有与宣扬奥古斯丁的神爱（caritas）有关的意义。因此，在现代读者看来是世俗的作品，都是以反讽手笔写成的，它的最终意义是宗教的。释经派与现代中世纪研究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强调中世纪的绝对“另类性”，文本意义密封于特定的文件里，只有受过专业（如神学）训练的人才能取得打开的钥匙，领会它的真意。这种模式呈现一个死板的、总体化的、单一意义的和单质无味的基督教世界。<sup>④</sup>

60 年代以后，西方整个学术界都受到费迪南·德·索绪尔引起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的影响，语言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本质，颠覆了以前各种实证主义和历

① See Patterson, *Negotiating the Past*, p. xi.

② See Hans Robert Jauss, “The Alterity and Modernity of Medieval Literature”,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10 (1979), pp. 181–229.

③ See Paul Zumthor, *Spe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Sarah White.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pp. 28–29, p. 81.

④ See Patterson, *Negotiating the Past*, pp. 26–39.

史主义建立的体系，导致 70 年代以后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的学说，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拉康精神分析派、后殖民理论、同性理论等。中世纪研究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中世纪研究派别很多，本文无意也不可能点评它们的重要成果，只想指出它们在“现代”与“另类”问题上的一些共同特色。首先，它们拒绝了过去学者所强调的中世纪现代性，拆穿那些死板和一以贯之的体系的假象，把注意力放在现代人关心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问题上。其次，它们更关心中世纪的另类，也就是社会边缘与政治弱勢的群体，陈现他们的观点与经验。它们虽然抛弃了过去的体系，却接受了新体系，即使完全反体制的酷儿理论都接受某些拉康和新女性主义的观点。因此，这些研究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如强加现代观点于中世纪、现代理论未必适用、过度标榜中世纪的“另类性”、抛弃“正常的中世纪”的中心问题、专搞“病态的中世纪”的边缘群体、专门揭发中世纪的“黑暗面”和“奇形怪状”等。<sup>①</sup> 这些批评家的逻辑很有问题，他们好像认为只有过去的模式才是理性的、进步的和正面的研究，完全不了解新模式扩大了对中世纪的认识，也同样是理性的、进步的、正面的和现代的。现实总是无比复杂、甚至一塌糊涂的，难道只有把中世纪洗刷得干干净净、“博物馆化”了才算是学术研究吗？

笔者在此勾勒西方中世纪研究的概况，只是为了指出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具体表现为学者如何对待中世纪的“另类”与“现代”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无论建构还是解构中世纪的模式或体系，学者都热衷于理论，认为理论可以解释中世纪的文化现象（如文学作品）或赋之以超然的抽象意义。无论采用什么理论，都是有现代性的。现代理论之多，翁贝托·艾柯曾列出过 10 个小中世纪。<sup>②</sup> 其实何止此数，每个中世纪学者都有一个或多个中世纪。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再看现代学者的“宫廷爱情”论述有什么现代性。

### 三、点评“宫廷爱情”研究

男女爱情并非一个永恒的文学题目，笔者曾在《诸神的黎明》里提到，诗

<sup>①</sup> See Paul Freedman and Gabrielle M. Spiegel, "Medievalisms Old and New: The Rediscovery of Alterity in North American Medieval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 (1998), pp. 697 - 704.

<sup>②</sup> See Umberto Eco, *Travel in HyperReality: Essays*, trans. William Weaver, San Diego: Hart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p. 61 - 72.

歌、爱情和美人是欧洲诗歌新开始才出现的主题。<sup>①</sup>可是，爱情却是现代读者和学者最有兴趣的题目之一，它成了研究中世纪文学的主要项目。“宫廷爱情”的婚外情和它的中世纪色彩，出现在一个设想为极端虔诚的基督教世界里，至少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人觉得意外。因此，“宫廷爱情”变成中世纪的典型另类，立刻被人采用，成为中世纪爱情的典范。如果以上的立论还算正确的话，以下点评的“宫廷爱情”研究正是中世纪文学研究之现代性的最佳写照。

加斯通·帕里斯发明的“宫廷爱情”名词和定义广为学界采用，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对它做多少修正，只把它应用到更多其他中世纪文学里。譬如，加斯通·帕里斯把特里斯坦的爱情和朗思洛的“宫廷爱情”区分开，后来学者却把两者混为一谈。加斯通·帕里斯只提到南方普罗旺斯抒情诗扮演的次要角色，后来学者却把这些抒情诗作为“宫廷爱情”的主要依据，把 fin' amor 作为它的同义词。不过，学者最热衷的是爱情永远得不到满足这一点，它的最高境界是禁欲或者中止性交，以保持激情的强度。因为欲望一旦满足了，爱情就变得淡而无味了。

这种崭新的爱情观从何而来，如此明显地反宗教和反社会的文学怎么会出现于基督教中世纪欧洲，它的来源和意义是什么，都成为热门的问题。于是，学者提出阿拉伯、基督教异端、圣母崇拜、新柏拉图主义、封建社会等起源理论，这类学术著作汗牛充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考鲍厄斯的专书。笔者只想点评几个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的意见，给大家作参考。

C. S. 刘易斯的《爱情寓言》是一部研究英语文学的经典名著。可是，他给“宫廷爱情”下的定义，几乎使他声名狼藉。他把加斯通·帕里斯的四个特征包装为大写的 Humility, Courtesy, Adultery, Religion of Love, 也就是谦恭、礼貌、通奸、爱情的宗教。和加斯通·帕里斯一样，他也只依据克雷蒂安和安德莱阿斯的材料，加上其他学者对普罗旺斯抒情诗的论述，自己没有提出什么独立的佐证。他也把《论爱情》当作历史文献，称香槟伯爵夫人玛丽为“宫廷爱情的权威”。这个界定“宫廷爱情”的第一章是全书的败笔，作者的精彩文章尽在后头。只要沾上“宫廷爱情”，就非常牵强附会。如他称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是称赞“宫廷爱情”的完美作品，一部新版的《朗思洛》。<sup>②</sup>可是，除了开头，克瑞西达何曾拒绝过特洛伊罗斯？他们的爱情怎么能算是通奸？有何非法之处？爱神早就成为

① 详见李耀宗《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② See C. S. Lewis, *The Allegory of Lov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6, p. 20, p. 176, p. 177.



修辞程序，还有什么宗教意味？用“宫廷爱情”来解读这首诗，简直是画蛇添足。

德尼·德·鲁日蒙的《西方世界的爱情》（1938，1954 修订）是一部影响极大的畅销书。他研究“宫廷爱情”的出发点、取向和命题都和加斯通·帕里斯不一样，如他依据的是特里斯坦神话而不是朗思洛故事。他的命题是：现代婚姻问题起源于基督教的神爱（agape）与异端的激情（eros）的冲突，异端激情对基督教婚姻的反动。这个 11、12 世纪从巴尔干传入今日法国南部的异端卡特尔（Cathar）“神奇地”创造了普罗旺斯抒情诗，宣扬起“宫廷爱情”的神秘宗教。他东拼西凑、断章取义地搜集了大堆诗句，“证明”“宫廷爱情”的来源是卡特尔异端。卡特尔异端反对婚姻和禁止性交，抒情诗歌颂的“宫廷礼节”（cortezia）就是这种禁欲的爱情法规。而特里斯坦神话讲的异端神秘故事就是，“相爱是不快乐的”。特里斯坦并不爱绮瑟，只爱爱情本身和死亡，唯有神爱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sup>①</sup> 德·鲁日蒙借用中世纪文学来建构他的神话和理论，“宫廷爱情”只是他的道具。他的论证全靠模拟联想，对中世纪文学研究本身价值并不大。

关于“宫廷爱情”的论述到 20 世纪中叶已经泛滥成灾。当时西奥多·西尔弗斯坦在其综述评论里抱怨说，学者为了建立理论断章取义，弄不清他们到底是在写概念史、社会史、心理学、语言学、还是文学批评。<sup>②</sup> 第一次全面质疑来自美国学者，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论爱情》。释经派的代表人物小罗伯逊首先发难，指出那是一部以反讽手法写出的讽刺作品（1951），和“宫廷爱情”毫不相干。<sup>③</sup> 《论爱情》前后并没有矛盾，整本书的爱情观与当时的基督教正统思想吻合，都是谴责与神爱（caritas）对立的奸淫（fornicatio）。<sup>④</sup> 最后他干脆宣布“宫廷爱情”从没存在过，与中世纪无关，是理解中世纪文本的障碍。他的战友约翰·本顿进一步搜遍香槟郡的文献档案，找不到安德莱阿斯在那里供职的确切证据。玛丽需要读法语翻译，大概也看不懂拉丁文，书即使是在香槟写的，读者对象恐怕是其他教会学校出身的教士。玛丽自从母亲埃莲诺尔再嫁以后也没机会

① See Denis de Rougemont, *Love in the Western World*, trans. Montgomery Belgion,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4, p. 143.

② See Theodore Silverstein, "Andreas, Plato, and the Arabs: Remarks on Recent Accounts of Courtly Love", in *Modern Philology*, 47 (1949-1950), p. 125.

③ See D. W. Robertson, Jr., "The Doctrine of Charity in Medieval Gardens: A Topical Approach through Symbolism and Allegory", in *Speculum*, 26 (1951), pp. 24-49.

④ See D. W. Robertson, Jr., "The Subject of the *De Amore* of Andreas Capellanus", in *Modern Philology*, 50 (1952-53), pp. 145-161.

和她见面和来往，香槟并不是什么宫廷爱情的中心。<sup>①</sup>他也批评“宫廷爱情”不是中世纪的专有名词，没有具体内容，建议从此禁止使用它。<sup>②</sup>

不过，对“宫廷爱情”批判得最简洁有力的是 E. 塔尔博特·唐纳森的一篇幽默短文，叫《宫廷爱情的神话》（1965）。他发现大家给它的定义都不一样，用来解读中古爱情诗歌，常得扭曲定义来迁就诗歌，或者更糟的，得扭曲诗歌来迁就定义。他也指出刘易斯的书，第一章以后就和通奸无关。按照刘易斯的定义，乔叟诗歌里最够资格当“宫廷爱人”的人物应该是《磨坊主人故事》里的阿伯索伦（Absolon），大家一定很熟悉他不幸而可笑的遭遇。唐纳森把《论爱情》放在中世纪辩论文学传统里，认为整本书是写给教会学堂的毕业生看的，让那些独身教士欣赏俗人家妇女打情骂俏的笑话。<sup>③</sup>

全盘否定派并没有让学者们停止使用“宫廷爱情”，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它上头加上引号，以示存疑。即使如此，它仍然随着学术风尚的变化，继续保存下来。下面笔者就从社会历史研究、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挑几个例子，看学者们怎样继续使用这个名词和概念。

从中世纪社会阶级关系的角度研究“宫廷爱情”的学者，主要以德国的厄里希·科勒和法国的乔治·杜比为代表。文学史家科勒认为 11 世纪末、12 世纪初，欧洲出现了新兴的骑士阶级，和当权的大贵族阶级产生矛盾，带来紧张的社会关系，引起政治危机。这些新贵都比较年轻、出身贫穷而且没有领地，他们靠武力为自己争取地位和封地，加入上层贵族社会。中世纪历史学家杜比研究法兰西北方光棍骑士（juvenes）的论文，补充了科勒的阶级分析。这些尚未成家的年轻人到处流浪，最期望的就是找到结婚对象，追求有产业和继承产业的贵妇。<sup>④</sup>要把大小贵族整合为一个阶级，就需要有一套一致认同的理想和生活规则，因此产生了可以控制和驯服年轻新贵的宫廷礼仪（courtoisie）。“宫廷爱情”就是以爱情教育他们的工具，既可宣泄那些出身低微的骑士追求高级贵族妇女的欲望，也反映了贵族阶级整合的意识形态。<sup>⑤</sup>譬如，抒情诗里宣扬的礼节，讲究对主上

① See John F. Benton, "The Court of Champagne as a Literary Center", in *Speculum*, 36 (1961), pp. 551 - 591.

② See John F. Benton, "Clio and Venus: An Historical View of Medieval Love", in F. X. Newman, ed., *The Meaning of Courtly Love*, pp. 19 - 42.

③ See E. Talbot Donaldson, "The Myth of Courtly Love", in *Speaking of Chaucer*, New York: Norton, 1970, pp. 154 - 163.

④ See George Duby, *The Chivalrous Society*, trans. Cynthia Postan, Berk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dward Arnold, 1977], pp. 112 - 122.

⑤ Erich Köhler, *Ideal und Wirklichkeit in der höfischen Epik, Studien zur Form der frühen Artus-und Graldichtung*, Tübingen 1956, s. 141.

(夫人)效忠、对下人慷慨(赏赐),上下互相照顾,就会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他的阶级矛盾与整合的学说受到一些批评:譬如,萨拉·凯指出宫廷内部主要矛盾存在于教会和世俗成员、而不在大小贵族之间,<sup>①</sup>西蒙·冈特则批评他只注重整合和升华,忽略了南方抒情诗的颠覆性。<sup>②</sup>

R. 霍华德·布洛克在《中古憎女观与西方浪漫爱情之发明》一书中表达的观点堪为后现代派的代表。他先解构“宫廷爱情”的意识形态,认为基督教的憎女观和崇拜圣母都是把女性抽象化的反女性两面手法,而新出现吟诵遥远爱情和崇尚女性的宫廷诗歌实质也是同样抽象和反女性的,因为诗人吟诵、崇尚的只是自己。他把西方浪漫爱情文学的起源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里,如家庭结构、婚姻与继承的习俗与法律去讨论。他又把杜比的光棍骑士理论应用到南方社会,说南方妇女继承财产和经济力量都比较高,“宫廷爱情”就是光棍贵族面对妇女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的反应。当男人发现恭维女人比憎恶女人更有效地“占有或重新占有女人”,他就会神化女人。可是,一旦女人是男人所支配的财产,她就可以被贬为万恶之首。换句话说,“宫廷爱情”是控制女性的意识形态工具。<sup>③</sup>

布洛克给“宫廷爱情”去神话化也和女性主义派的观点一致。女性主义者人才济济,各有各的看法,很难挑选所谓有代表性的人物,笔者只能通过有限的阅读来点评几位比较知名的学者。罗贝塔·克鲁格认为宫廷文化把女性能动的主体转化成被动的客体,传递了父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可是也蕴含了女性读者反抗的可能性,以夺回女性的主体能动性。<sup>④</sup> 克里斯提那·马尔塞洛-尼茨亚把“宫廷爱情”放在男性掌权的社会关系中,指出光棍骑士虽然追求贵妇,但其真正的目标是她的丈夫。因此,女人只是做两个男人的中介。<sup>⑤</sup> 因此,“宫廷爱情”的两性关系远不如同性关系重要。冈特也认为,诗人虽然歌颂女性,其实他的真

① See Sarah Kay,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urtly Love and the Origins of Courtly Poetry: The Evidence of the *Lauzengiers*", in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26 (1996), pp. 219 - 225.

② See Simon Gaunt, "Marginal Men, Marcabru and Orthodoxy: The Early Troubadours and Adultery", in *Medium Aevum*, 59 (1990), pp. 65 - 68.

③ See R. Howard Bloch, *Medieval Misogyny and the Invention of Western Romantic Lov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1; 详见李耀宗《理解中世纪与女人:评拜南的〈体解与救赎〉与布洛克的〈中古憎女观与西方浪漫爱情之发明〉》,《当代》,2003年第189期,第102-103页。

④ See Roberta Krueger, *Women Readers and the Ideology of Gender in Old French Verse Ro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3, "preface".

⑤ See Christiane Marcello-Nizia, "Amour courtois, société masculine et figures du pouvoir", in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6 (1981), pp. 979 - 980.

正听众是男性。因此,情妇只是个中介,宫廷诗歌的本质也是同性的。<sup>①</sup> E. 简·彭斯也认为“宫廷爱情”虽然表面是男女在理想化的宫廷里相爱,其实只有男人之间的爱情。女人在安德莱阿斯的论文里只存在于修辞与幻想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过,女性主义读者仍可解读“宫廷爱情”的文本,看出它的压迫女性的结构是脆弱的,还有反抗的余地。<sup>②</sup> 虽然有压迫性,彭斯却认为有保存“宫廷爱情”的必要。一来它是抛弃不起的文化遗产,二来要把它分成以男性为中心的与以女性为中心的两类。前者设立范式,后者与之较量,对它质疑。<sup>③</sup>

换句话说,只要父权统治意识形态存在,就需要对它进行抗争和颠覆,以女性为中心的“宫廷爱情”就是抗争和颠覆的工具。不过,女性主义学者维持一个男性统治的标志,也难免有点讽刺意味。倒不如像凯瑟琳·格拉芙戴尔那样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只“表现男性文化,与女性在社会扮演的角色或男性对女性心理与性欲观点的改变无关……女性形象是个空洞的记号,上面填满了男性霸权的反映”<sup>④</sup>。她研究宫廷文学和法律里男性对女性施暴强奸的记录,以及戏仿如何颠覆宫廷文学,毫不暧昧地鞭挞“宫廷爱情”意识形态,也许更有意义。<sup>⑤</sup>

除了一些女性主义者把它当反面教材保存下来之外,“宫廷爱情”到现在还有市场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精神分析派对它的重视和挪用。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中世纪文学的研究流行已久,比较简朴的方法是在作品里寻找与性有关的形象和语意。如鲁本·C. 肖拉吉安研究阿诺·丹尼尔(Arnaut Daniel)有名的六韵连环诗,把六个韵字都和两性的性器官和性交联想起来,把文学研究推到想入非非的境界。<sup>⑥</sup> 后来受到拉康影响的精神分析派学者,如让-查尔斯·于谢和亚历山大·卢平,就做得比较细腻精致,把作品分析提升到理论的层次。<sup>⑦</sup> 仅以萨拉·凯的研究为例。

凯承认“宫廷爱情”一词反映现代批评的预想多于中世纪的现实,她的研

① See Simon Gaunt, "Poetry of Exclusion: A Feminist Reading of Some Troubadour Lyrics", i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85 (1990), p. 311.

② See E. Jane Burns, *Courtly Love Undressed: Reading Through Clothes in Medieval French 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2002, pp. 59-69.

③ See E. Jane Burns, "Courtly Love: Who Needs It?", in *Signs*, 27 (2001), pp. 23-57.

④ See Kathryn Gravdal, *Ravishing Maidens: Writing Rape in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 and Law*,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p. 12.

⑤ See Kathryn Gravdal, *Vilain and Courtois: Transgressive Parody in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Lincoln: Univ. of Nebraska Press, 1989.

⑥ See Rouben C. Cholakian, *The Troubadour Lyric: A Psychoanalytical Read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0, pp. 138-147.

⑦ See Jean-Charles Huchet, *L'Amour discourtois: la "fin" amor chez les premiers troubadours*, Toulouse: Privat, 1987; Alexandre Leupin, *Barbarolexis: Medieval Writing and Sexuality*, trans. Kate M. Cooper, MA: Harvard UP, 1989.

究有历史和心理两个取向，前者依赖于贝佐拉（Reto Bezzola）的历史巨作，后者则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因为宫廷文学是世俗话语和宗教话语交涉出来的成品，复杂的背景产生了很多矛盾，如爱情的欲求与规范、满足与禁欲等，使它的意义难以确定。除了历史环境，如十字军出征与婚姻立法给的社会压力之外，凯还从心理建构的角度去思考“宫廷爱情”呈现的矛盾内容。因为拉康相信“宫廷爱情”诗歌是现代主体性的来源，凯也认为现代人对“宫廷爱情”的兴趣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与性别认同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引起无可避免的紧张”。于是她采用拉康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12 世纪的抒情诗、罗曼斯和圣徒传，虽然她也承认拉康对中世纪的知识极其有限。她《宫廷的矛盾》一书的最大长处是历史部分，虽然她过分强调教会文化的影响，忽略了宫廷里文化互动也是随时在变动的，谁影响谁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光笼统地把每个中世纪诗人都上过教会学校作为论据。<sup>①</sup> 书里的精神分析部分，对内行人是画蛇添足，对外行人简直是对牛弹琴，把原来已经暧昧难懂的诗歌弄得更加扑朔迷离。

拉康以博学广识、深得弗洛伊德思想的真髓而风靡 60 年代的巴黎知识界，可是，他讲学的风格放任、不守学界常规，因此常犯些无伤大雅的错误，如几乎所有希腊文翻译都是错的。<sup>②</sup> 他接受了德·鲁日蒙和一些研究中世纪的学者的看法，认为“宫廷爱情”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诗人一面拼命追求爱情，可是，又拒绝接受爱情，他们的诗歌是欲望的升华。依拉康的说法，“宫廷爱情”对“女性对象的升华”是升华的范式。它像个扭曲折射的图画（anamorphosis），让人从不同的角度看见不同的景象。而分析家可以从宫廷抒情诗里吟诵高不可攀的贵妇对象，看见诗人自恋性的欲求投射，女性对象其实是个空洞，两性性爱是不可能的真实。拉康认为这是西方精神发展史的一件大事（页 136），由它发展出一套道德规则，包括宫廷礼节，把女性理想化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象。为了显示他的博学，他提到“1917 年才被发现和出版的”安德莱阿斯抄本，作为“宫廷爱情”的历史证据。他肯定没读过加斯通·帕里斯在 1883 发表的论文，也不知道 E. 特洛耶尔（E. Trojel）的 1892 年拉丁文标准本的存在。他还选了阿诺·丹尼尔的一首流行的淫秽诗作为女性对象是个黑洞的例子，显示出“升华想象的深

<sup>①</sup> Kay, *Courtly Contradictions: The Emergence of the Literary Object in the Twelf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1, p. 1, p. 27, p. 25.

<sup>②</sup> See Bruce W. Holsinger, *The Premodern Condition: Mediev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or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80.

层暧昧”。<sup>①</sup> 阿诺诗里的情妇想知道情人爱她爱到什么程度，肯不肯往她的屁股眼吹气。拉康用这个屁股眼来说明“弗洛伊德的东西”，以那首诗为他的分析理论作证，既建立了12世纪和现代连续性，意味着中世纪的现代性，又给他的巴黎听众一点中世纪的异类，满足他们搜奇猎异的口味。

当今受他影响的思想家很多，其中克里斯蒂娃和齐泽克都讨论过“宫廷爱情”，使它继续被学者使用。克里斯蒂娃肯定它在西方爱情历史和故事（法语 *histoire* 的双义）的重要地位，不过，她更强调它和明谷的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爱情观之间的联系，以及抒情诗歌是一种符咒性的吟诵（*incantation*），吟诵的就是表演诗歌的喜乐（*performative jouissance*）。<sup>②</sup> 齐泽克更把“宫廷爱情”和被虐待狂与现代小说电影联结起来，给他的回推（*retrogressive*）历史理论提供了证据。也就是说，有了19世纪发现的被虐待狂，才看得清12世纪宫廷诗歌里的情人之间排演的主奴戏剧。<sup>③</sup> 他引用了同一首阿诺的诗，还自以为幽默地加一句“中世纪个人卫生的恶劣程度”，以补充拉康的“宫廷爱情”理论。为什么精神分析主义者如此热衷于“宫廷爱情”？笔者认为这只能归过于他们（凯、克里斯蒂娃和齐泽克）的文化认同感与怀旧，希望把中世纪和现代衔接起来。

笔者在《诸神的黎明》一书里已经批评过“宫廷爱情”的适用性，指出欧洲诗歌新开始的时候，真是百花齐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爱情诗歌。光是奥西坦抒情诗里就有很多主题和不同的爱情观，不能用单一的概念或术语来涵盖。冈特曾经感慨地说，批评家常过分严肃，看不见诗歌的“调皮劲儿”（*playfulness*），真正指出上述学者的通病。<sup>④</sup> 研究文学虽然是严肃的工作，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文学本身好玩的一面。<sup>⑤</sup>

[作者简介] 李耀宗，男，1944年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专治欧洲中世纪文学与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责任编辑：张锦

① 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 1959–1960, Jacques-Alain Miller, ed., trans. Dennis Porter, New York: Norton, 1997, p. 112, p. 128, p. 136, p. 162.

② See Julia Kristeva, *Tales of Love*,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7, p. 288.

③ See Slavoj Žižek, “Courtly Love, or Woman as Thing”, in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en and Causality*, London: Verso, 1994, pp. 89–112.

④ See Simon Gaunt, *Troubadours and Iron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9, p. 34.

⑤ 本文原为作者2009年在台湾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讲学的讲稿，后整理成文。衷心感谢沈弘教授、郝田虎副教授和张素雪同学对本文的贡献。